

秦晓鹰 著

历史的错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个蒙难的部长.....	(1)
不许穿军装的将军	(21)
从此露“峥嵘”	(65)
审判真理	(82)
红卫兵出世记.....	(117)
嘿,闯世界	(146)
历史的错位.....	(176)
迷狂的音符.....	(184)
人路.....	(196)
沙漠大撤离.....	(236)
大舸中流	
——访毛泽东秘书林克.....	(248)
沙场未归人.....	(261)
九死一生.....	(301)
人民的璞玉	
——党的优秀宣传员傅显忠事迹探源.....	(311)
人尽曲未终	
——人民音乐家施光南素描.....	(321)
来自喜马拉雅山.....	(336)
平凡的太阳.....	(347)
我的第一位上级.....	(360)

第一个蒙难的部长

1980年金秋的一天，在北京正义路一座灰色楼房里，历经劫波和屈辱的中国人民开始了对灾祸酷烈的十年“文革”的审判。金红、庄严的国徽下，一伙世人皆曰可杀的罪犯被押上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长手边的卷宗里放着原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同志的遗孀李蕴华和她的四个子女写的控诉书；白色屏幕上，出现了张霖之被揪斗，毒打的案例幻灯片。全场肃然，只有小声的抽泣，人们又被带回了那个疯狂的年代，见到了第一个被虐杀的部长……

从“武训传”到“红岩”

1950年，张霖之在刚刚解放的重庆市任市委书记。

这个被蒋介石集团的首领在抗战时期盘踞七年的“陪都”已经解放三百多天了。水、电、交通刚刚恢复正常，学生、市民和解放军昼夜清除着街道上的瓦砾、碎砖，嘉陵江上往来的火轮“呜呜”吼着，拖着长烟消失在江雾里，胜利纪念塔下重又是车水马龙，吆喝叫卖声一片。这一切，都与张霖之的日夜奔波分不开。此刻，忙碌了一天的他，偷偷躲过秘书和警卫员，只身来到军管会大楼下的一家小馆去吃“抄手”。这个离家20多年的北方人，还是馋带馅的面食。看得出，老板对这位大军同志已很熟悉。这不，其他店铺已经打烊关门，只有这扇虚掩的门里还洒出一线灯光。

“这几天生意好不好做？”

“你们来了，不用担惊受怕了，开门时间长，又没人吃白食，生

意硬是好做得很哩。”小老板一边实心实意地搭话夸着，一边擀皮包馅。转眼，锅里已经飘出香味。忽然，门外传来一声“报告！”

进门的是王秘书，一个清瘦、腼腆的大学生。张霖之看到小王有点责怪的眼神，连连打着哈哈说：“来来来，快出锅了，一起吃吧。”秘书也为自己捅破了这层窗户纸有些不自在，索性开门见山：“首长，北京刚来了个电话，这是记录。”

看到是“毛办”的落款，张霖之先是一愣，待到读完，只淡淡地说道：“来了再谈。”说完，端起碗“呼呼”地吃了起来。

从毛泽东主席办公室打电话的是江青，她要求原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协助弄清编写电影剧本《武训传》的原委。在张霖之看来，这是小事，与百乱待理的全市工作比，不值一提。就是带着这种情绪，四天之后，他接待了打“前站”的调查组。

“我在山东时，堂邑县是有个叫武训的，在老辈人中很有些名气哩。清朝末年民不聊生，那么一个要饭的穷人，攒钱办学堂，多不容易啊。”

“调查团”那几个人低头“刷刷”地记着，间或交换一下眼色，讳莫如深地笑笑。

“读书向来是被看成圣人之道，一个乞丐办这种事，可谓开天辟地。所以山东老百姓很敬重武训。无论说书唱戏，有不少唱这位‘武豆沫’的段子。”

“您在那些东西里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吗？”一个戴白框眼镜的人不客气地截断了他的话锋。张霖之斜乜此人一眼，呷了口茶，顺势看看腕上的手表：9点。糟糕！再有半小时，公审中美合作所敌特分子大会就要开了。他暗暗思忖，不觉有些烦躁起来，索性解开衣扣，说：“有什么问题嘛！演戏时我们都去看了，生旦净丑都扮得不错，群众非常欢迎，说这演的是穷庄稼汉的圣人。”

接他开会的汽车响起喇叭，张霖之披衣站起。

“电影《武训传》您看过了吗？”

“想看，就是没时间。”张霖之说罢拉开房门，又转身向秘书吩

附：“晚上牛角沱演戏，让这几位同志去看吧。”语毕，人已走了。听着张霖之“嗵嗵”的下楼声，房里的人怔怔地，神色有些异样。

第二天，江青以李进的化名来到重庆。张霖之虽然仍是那几句话，却无可奈何地应酬了一个下午。

几个月后，张霖之接到通知，来到西南军政委员会负责人办公室。这位负责人不露声色地把个牛皮纸卷宗推过来。张霖之一眼就看到了毛泽东那熟悉的笔体：

“……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

毛泽东的批件后面，还有一份厚厚的《武训历史调查记》。

老首长轻轻拍拍正在出神的张霖之：“老张啊，知道吗？这是江青搞的调查，蛮有分量哩！”张霖之没有说什么。对这样一种结果，他是始料不及的。窗外吹来一股湿气，又下雨了。山城的街巷，黑色的木房、路边的野花都在迷蒙的雨幕中悄然隐没，车辆和人的喧闹也一起融进了漫山遍野的雨声里……

十四年过去了。张霖之的身上有着多大的变化呵！壮年之躯已显出龙钟老态，鬓角过早地发白了。而变得更多的大概是性格，从爽朗善谈变得不苟言笑，不爱交际。他只希望在自己管辖的煤炭系统能为国家交出更多的“乌金”，能让老百姓在寒风凛冽的冬夜有一炉煤、一盆炭火。说起来，我们的煤炭部长的家与江青起居的中南海只有一公里的直线距离，但他自1953年进京之后，丝毫没有动过再相见“第一夫人”的念头。虽然他明明知道，随着党内民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她的名字正在升迁簿上跳跃式地向前排列。他愿意她把自己忘掉。

江青也在变。从上海滩跑到延安的第一天起，从脱下旗袍穿上土布衣后，她就为自己的遭遇愤愤不平。与毛泽东分居后，特别是

当上“中央文革”副组长后，她才真正品尝、咀嚼到“权力”的滋味：既享受着封建后妃梦想不到的现代化生活，又行使着资产阶级贵妇用金钱买不到的特权……但是，这个偏狭的女人并没有忘记张霖之，没有忘记当年在重庆碰壁而归的“一箭之仇”。

1966年8月的一天，酷暑难当。白天，全北京城都弥漫着一股燃烧的气息，里面还夹杂着柏油路晒化了的沥青味。到了傍晚，一层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色东西落在大街小巷，落在每个院落里。藤萝架下，几个大点的孩子正在争论着街头上剪辫子、剪瘦裤腿的“革命行动”究竟对不对。李蕴华没有参加他们感光趣的话题，只端来一锅绿豆汤晾着。丈夫还没有回来。这些日子，煤炭部党组召开的“群众民主会”开得越来越激烈，李蕴华隐隐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担心。是因为那种不容分辩的气氛？还是因为他平素耿直的秉性？“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不知怎么，这句不着边际的话竟跳出了她的脑海。正在这时，院门“咣当”一声，张霖之踏着暮色回来了。

“爸爸！”

“爸爸，我们今天看见西单大街上在破四旧哪！”孩子们欢快地蹦跳着迎了上去，一个个像“耳报神”叽叽喳喳讲着新闻。父亲接过递来的蒲扇挥了两个，心不在焉地搭讪两句，就示意妻子跟他进屋。

“今天又有人专门请我看戏。”

“谁——江青？”

“还能是谁，我已经打电话告诉她的秘书，不去！”

“你，你怎么也不去应付一下，这个人……”李蕴华原想说“这个人不好惹”，但她忍住了。

“我的好同志呀！就是个看戏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再说我对戏剧根本不懂。”

“可你这下算把她得罪到底了。”

张霖之正在点烟的手微微发颤，他深深吸了一口，大声说：

“《红岩》与她有什么关系？一个是江姐，一个是江青，怎么能混淆呢？今天总理还来电话，要我确保今年第三季度的原煤生产。我是个共产党员，煤炭部是党交给我的岗位。我不能为了自己的纱帽翅，擅离职守，更不能说违心的话。”他转身直视着李蕴华，一板一眼地说道：“江青这样搞是戏一中一有一戏，懂吗？”妻子理解地点点头。张霖之这时才渐渐平缓下来，他不再说什么，只久久伫立在一幅字画前。那是何香凝老人三年前在广东从化送给他的泼墨写意：寒梅。梅枝挺立，孤削似笔。从暗绿的叶子里显出十几朵花，愤怒而傲岸地开着，赫然地在雪中亮着，像火。

李蕴华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在此之前，江青已经请张霖之看过一次戏。1965年底，不知哪个无耻小人曾向江青反映，社会上有传言，说轰动一时的小说《红岩》中那位江姐就是以江青为原型的。这本来是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通俗演义式的“民间传说”，不想，却搅得江青五内不安。恰恰在这个时候，某剧团把《红岩》改编成了现代京剧。江青不禁喜出望外，如果能顺势来个偷梁换柱，一可以树起自己的形象，二可以在京剧改革中又立一功。江青把《红岩》剧组调到北京后，渐渐想到了张霖之。这个老重庆市委书记在《武训传》上犯有前科，不怕他不按照自己的授意提“修改意见”。于是，她毫不犹豫地在一张红请柬上签了字，送到了煤炭部——“请届时出席”。

张霖之只好去看戏了。演出前，在贵宾室他与江青有一次短暂的交谈。20多年后，当时的目击者这样回忆道：“他们在里面说什么，我不清楚。约摸几分钟的光景，江青和张霖之各自向剧场观众席走去。不知是谈话不投机，还是屋子凉，江青神色很不好，披上黑斗篷，喊着要把暖气烧得热点。我随他们进了场。全场只有二三十人。江青和张部长挨着坐在第五排一、二两号，我坐在第十排正中。出于某种原因，演出当中我始终注意观察这两个人。使我极为吃惊的是，整整两个多小时，江青和张霖之谁也没有侧身与对方讲话，谁也没有理谁，连头也没有动动。我为霖之同志捏一把汗。这个举

动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太紧张了！”

散戏之后回到家中，一下汽车，李蕴华就急急地问张霖之：“你和她谈得怎么样？”

“这个人比十几年前的脾气更大了。我没有和她谈什么，她不讲话，我有什么好说的？”张霖之闷闷地点燃一支烟，“话不投机，可以拂袖而去。我能正襟危坐陪上这么长时间，已经很不错了。”

李蕴华不想再问下去，丈夫那犟牛似的北方汉子的性格，她是太了解了。他对党内生活的种种忧虑从来不向别人多吐露什么，即使是对结伴30年的妻子也是一样。夜深了，望着早就发出鼾声的他，望着那张刀削斧凿般有棱有角的面庞，她轻轻地叹了口气。不知为什么，她忽然想起一件与今晚不相干的事——

1959年参加庐山会议后，张霖之竟几天不思茶饭，满面愁容，就是勉强端起饭，也常常忘了动筷子；夜里不是持卷长读，通宵不眠，就是早早躺下，却又辗转反侧，不能入睡。反常、太反常了。李蕴华忍不住要问个究竟：

“老张，我们是20年战友、20年夫妻，难道不能对我讲讲实情吗？”

张霖之披衣坐了起来，轻轻地摇了摇头：“蕴华，看来我的思想真跟不上喽！”妻子屏住气，听他继续说下去：“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会是反党分子，把历史上的功臣也说成是同路人？”

“谁？”

“彭老总，彭德怀同志！”听到这几个字，李蕴华好像五雷轰顶，一下子惊呆了。彭总的为人那是有口皆碑的呀。

“这次在庐山，他给主席写了封长信，据说都是对大炼钢铁这类事不满意的话。即使是这样吧，这么个老同志、元帅，怎么就是反党呢？！”张霖之“笃笃”敲着床楞，眼圈都红了。

夹杂雨腥的凉风，摇晃着没有关好的窗户，发出难听的怪声。李蕴华从回想的思绪中挣脱出来。雷声压着头顶滚过，耀眼的蓝光照亮一条条银鞭似的雨柱。她下床去关窗户，忽然看见在写字台铺

开的一叠材料上，赫然写着《愤怒揭发张霖之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次讲话》，她惊得全身发颤。上面这样写着：“张霖之身为部长，不但不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反而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记得在一次党委扩大会议前，他说了这样一段恶毒的话：‘第一任都很厉害，古时的秦始皇现在的毛泽东。’同志们呀！看看吧，这不是赤裸裸的反党言论吗？！”在这些文字的旁边是丈夫粗犷的笔迹——“这纯粹是诬陷。一个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满足，就可以堕落到这种地步吗？参加那次会议的全体同志（除了他）都可以证明，我从未说过这些话！”

李蕴华看不下去了，她真想推醒丈夫问个究竟。可是当目光落在他日渐消瘦、灰白的面庞时，她的心都碎了。张霖之眼眶下那一抹黑晕，说明这些日子他在精神上忍受了多大的压力和痛苦。

对这个揭发人，她也还算是熟悉的。平时在机关，这位仁兄总是一上班先泡一杯花茶，然后便坐在写字台前划圈、打勾，一律写请转呈×××同志阅批。一大摞文件转眼消失，剩下的时间就是翻报纸或是和几个女科员家长里短地打哈哈。对张霖之部长毫不吝惜地消耗体力，奔波忙碌，他素来不以为然，认为是花样翻新，不守本分。正是这种气质上的差异和对人生的不同追求，使他们之间既熟悉又陌生。可是自从去年，煤炭部要增补两个副部长时，这位仁兄却亲亲热热地成了部长家的常客。每次来都必谈自己在解放区搞兵工厂的光荣历史。然而这一切都毫无结果。

“他的诬陷是不是与这件事有关呢？李蕴华不能看着亲人就这样长久地受人攻击。她要想办法保护他，让他离开北京这个漩涡。于是，她摊开白纸，挥毫陈诉：“总理、富春同志：……是否可让霖之同志到外地休息一下？”

9月2日，国务院工交口负责人批准并报周总理同意，“张霖之同志暂时离职休养”。就在这天，这位煤炭部长踏上了赴大庆油田的列车。

1980年12月，在监狱服刑的罪犯戚本禹交代：“1966年11、

12月之间，在一次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研究张霖之的问题时，康生手持一堆材料，说张霖之反对毛主席，是彭真圈子里的核心人物，是彭真的死党。江青、叶群也表了态。当时康生是彭真专案的权威人物，他说了没人反对，就算定案了。”

在戚本禹所供认的这次“中央文革”会议后的三天，江青亲自召见了北京矿业学院的“群众代表”。在一片狂呼声中，她拉着长腔说道：“你们刚才问到张霖之，我可以明白地说，他不是我们的人，是彭真的死党，也可以讲是私党，就是亲得很呐！”江青为自己这种笨拙的一语双关相当得意，“小将们，你们一上阵，真是摧枯拉朽，就可以把他和支持他的中国赫鲁晓夫打倒呀！啊、啊——我们支持你们。小将们，我也在与他们这号走资派斗争哩！只是没有武斗，不过，我要声明，谁要与我武斗，我一定自卫！”语无伦次的猖獗，猖獗到语无伦次，“我们要把张霖之这些走资派批倒批臭批深批透，批得他们就像当年的托洛茨基一样臭！”

此时，张霖之在外地收到了“立即返京，接受群众教育”的电报。

12月18日傍晚，张霖之回到北京，刚出站口，就看见了那辆熟悉的“红旗”车，女儿克非和妻子迎着他匆匆而来，唯独没见司机老于。他有些纳闷，顺口问道：“老于今天休息啦？”

“爸爸，这不是您那辆车，是段君毅伯伯派来的。他让您先到京西宾馆去，不要回家了。”女儿心直口快，话里透着紧张。

“家里出了什么事？部里运动搞得怎么样了？”张霖之焦急地问，他预感情况比他走时更为严重。

“家被抄了，我们被扫地出门了。”女儿的声音中带着抽泣。张霖之不再问下去。车开到北京饭店前，他下意识地向南看去，在饭店对面的煤炭部大楼上，贴着巨大的标语：“揪回畏罪潜逃的走资派张霖之！”“彻底批判煤炭战线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然间，一股被侮辱的悲愤之火在他心中腾起，他无法抑制自己，转身紧紧攥住妻子的手，两眼通红地喝道：“如果不是相信党，相信共产主

义，我‘红张’今天就跟他们拼了！”李蕴华不禁一愣，她有三十年没有听到“红张”这个称呼了！这是当年冀南老百姓对他的称呼，也是那些黑心的捕快衙役为了得到500块大洋，通缉这个“共匪”头子的称呼，当年，这个华北大平原养育的贫农儿子，粗壮、厚实，终日奔走在低矮的泥坯土房，奔走在青纱帐。他从太阳那儿吸收的热量好像格外充足，释放得也格外充足：脸庞、胳膊、脊梁、腿脚都是黑红色。加上用二十几个化名掩护身份，谁也叫不准，于是便统称为“红张”。“他是关云长显灵！”当地老辈子人都喜欢这么想，这么说，肥胖的“县太爷”和他的姨太太们也惶恐地这么说……

李蕴华激动地劝道：“事情总会弄得清楚，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咬咬牙顶住。”张霖之听她说完，先是一愣，然后坦然地摇摇头：“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决不会寻死。自杀就是叛党。我自己有错误不怕别人批评，也有决心改正。文化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还要努力理解，努力紧跟呢。真理是最强大的，我相信真理，再有多大困难，我也决不轻生。”在他严峻的目光中。李蕴华仿佛看见有一团异样的雷火在闪，在跳。

这一夜，下了大雪，气温骤降。第二天凌晨，异常寒冷，刚刚回到首都的煤炭部长，服从党组织的决定，踏着碎琼乱玉来到北京矿业学院。

七尺男儿化千秋鬼雄

此刻，张霖之正悲凉地坐在矿院1号楼313房间的条凳上。这是一间废弃了的学生宿舍。

他不是为自己被扣悲伤，而是哀叹这所中国矿业研究和教学的高等学府。这里。对他来说是太熟悉了，他曾经多次陪外国专家到学校参观，也在学院大礼堂给下矿实习的毕业班作过“两高、三学、四化”的报告。每年校庆，他都收到一张请柬……可是，仅仅半年光景，昔日静谧的校园却像飓风扫过，面目全非。最可怕的是那

一双双清亮的眼睛里竟燃起了横暴、邪恶的毒焰。这不，眼前审问看管他的这四个“红卫兵”头头，一个个挺胸叉腰，铁青着脸，似乎对他有着天然的仇恨。

几天过去，张霖之了解到，看守他的三个男学生都是1943年出生的贫农子弟，这使张霖之不禁产生了某种悲戚。

1943年，正是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那年，他在山东率领一支5000多人组成的游击队，与日寇周旋于鲁西北平原，控制了32个县的大片。那一年，冀鲁豫大旱，土地龟裂，寸草不生，八路军党政干部和指战员都靠树叶充饥，后来发现，树叶是老百姓的度荒食物，就下令“军队不许与民争食。”

还是那一年，区党委社会部负责人以肃反清托派为名，私设公堂，逮捕了一些好同志，有的被杀，有的被拷打，张霖之，这个乡师范专科毕业的“秀才”，当即命令放人，并严厉警告：“谁再打人，就开除他的党籍。”

往日飘散的烟云又聚拢在张霖之脑中，他感到郁闷。这一切，无论是对外御敌，对内护友，还不都是为了这些孩子吗！当年他们的父母分到土地时，曾流下了眼泪，难道到他们这一辈就干涸了吗？张霖之不愿再想下去，他只希望面前这些扭曲的事实只是一场恶梦。

12月24日，一辆黑色轿车停在学院教学楼前。两个身穿草绿色军装的人钻出车门。走在最前面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他目不旁视，径直走向会议室主席台中间的软椅。“同志们，我和××同志是奉江青同志之命来的！你们炮轰煤炭部一小撮走资派的行动好得很！”等着一阵“欢呼”的声浪退去，他扶扶眼镜接着说，“不过，现在你们的火力还不够，还要集中轰，狠狠地斗，狠狠地打。煤炭部在北京饭店对面，那里发生点什么外国人都可以看见。你们搞得热闹了，在那里，在大门口造反，可以震动全世界！”

两天之后。一群学生呼啦啦涌了进来，没等张霖之看清那些陌生的面孔，一个黑大个就对准他的腹侧猛击两拳。随着肋骨断裂，

他两眼生泪，头晕眼黑，应声倒在地上。他愤怒地抬起头，喝道：“不许胡来，不能武斗！”话音未落，一个家伙扑上来，揪着他的头发狠命地拖扯。有人把一块写着“彭真死党张霖之”，上面打着黑叉的大牌子挂在他脖子上。叫骂声、推搡声、椅凳倒地声响成一片。混乱里，张霖之的半边头发连扯带剪被剃光，斑斑血水滴落在胸前的牌子上，染红了上面贴的纸，又滴在眼前的水泥地上。最后，他被押上了楼外的大卡车，开始了第一次游斗。

就在这持续三小时的折磨的同时，煤炭部那个没当上副部长的“老干部”和另外几个人，正在策划更大的、更残忍的迫害。

12月28日，在煤炭部大礼堂举行的批斗会上，这位“革命领导干部”果然亮相了：“本禹同志的指示，对我来说是动员令，是催征鼓。我要像当年打日本、打蒋介石那样，和你们一起冲锋、扔手榴弹——”

“别摆老资格，少废话！快点揭发！”不知是谁在下面高喊。

“是，是是！我揭发、揭发！”这个“老干部”擦着脸上的油汗连连应诺。在他的如簧之舌下，一个个“罪名”、一顶顶“帽子”射向张霖之，也增添着受蒙蔽的学生、群众的颠狂和怒火。终于，一场丧失理智的人性的悲剧发生了。

（读者，为了不让我的笔蘸上鲜血，请允许我借用几段当事人的日记。日记作者是个良心没有泯灭的造反派。当我谥称他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时，他苦涩地笑了笑。）

1966年12月28

张部长被押至台上，强行按倒跪下。他使劲抬头不跪，李××、戴××猛扑上前，用力压。接着，又有五六个人一齐踩在他的小腿上，让他无法再站。又有些人拿着一根钉着木牌的棍子插进衣领，张部长拼力反抗，棍上的倒刺把他的耳朵、脸、鼻子都划破，顺着脖子淌血。会刚开完，“反到底”战斗队的负责人王××和一群人扭着张的胳膊穿过大、小礼堂游斗。后来到院里斗、大门口斗。张部长站在一张凳子上，上衣被扒光，在零下17℃的严寒里冻着。他遍体

鳞伤，双手举着木牌，又气又冻，全身哆嗦。有几个家伙说他站得不直，就用小刀子捅他、割他……1967年1月12日

汾西矿务局的李××来京，还带来一顶特制的60多斤重的铁帽子。……

斗争会一开始，几个小伙子就拎着铁帽子往张部长头上扣。他双腿打颤、脸色蜡黄，汗珠直往下掉。不到一分钟，铁帽子就把他压趴在台上，口吐鲜血。几个人重又逼他站起来，铁帽子戴不住，就用粗绳子勒住他的下巴，往上揪。这么折腾了三四次，张部长已奄奄一息，昏死过去……

1月的一天，有位俊俏的姑娘徘徊在矿业学院的楼群间，她身着一套深蓝色的制服，灰黑色的大围巾里，一双焦急的眼睛怯生生地四处扫看。她，就是张霖之的大女儿张克非。今天，克非背着妈妈，偷偷来到这里，要看看多日未归的父亲。忽然，她在学生食堂的炉灰渣旁，看见一个扫地的老人。多熟悉的身影，这不是……她连忙奔过去。

那位老人被吓了一跳，手上的扫帚差点掉在地上：“孩子，你怎么跑来了——”

“伯伯，我想父亲，您知道他在哪儿？”伯伯躲闪着姑娘哀切、凄凉的目光。刚要开口，见一行人走过来，连忙弯下腰装着干活，只用给身后的克非六个字，“在3号楼3层”。

张克非找到了3号楼。老远就听见那边传来一阵阵吆喝声、嘲骂声和口号声。姑娘的心狂跳着，紧走几步来到人群前，两脚却像灌了铅似的再也挪不动了。她惊呆了。十几天不见，父亲的形色枯槁憔悴，本来就虚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摇曳。爸爸下身穿着那条黑棉裤，是妈妈为他跪着挨斗专门做的。因为长，还挽了一截。“阴阳头”上的一半头发散落在脸上，胸前背后各挂一块用细铁丝吊着的大木牌。因为重，铁丝已经深深嵌入肉里，周围全是黑紫的血，手里还拿着一个代替铜锣的破洗脸盆。克非看着，一阵昏眩，几乎跌倒。

就在这一瞬间，张霖之麻木、呆滞的眼睛忽然亮了，他认出站

在面前的姑娘是自己的女儿。“非非，是你！”他把手里那张敲破了的洗脸盆猛地掼在地上，两行老泪顺着面颊缓缓流下。

“干什么的，你是他什么人？”几个披着绿大衣的造反派横在两人中间，“不说，就拿这老家伙是问！”随着骂声，皮带甩起落下，血丝和着泪水，在张霖之脸上划出难看的线条。“别打了！别打了！我是他的女儿，我是来看看他的。”

“狗崽子！狗崽子！”

“给她学校打电话，把这家伙带走。”

就在造反派打电话的短暂空隙，克非从父亲深沉的目光里感到他急于知道外面的一切。

“爸爸，我们都好。您、您还有粮票吗？”

张霖之没有回答，只是低沉地带着微喘说道：“回家告诉你妈妈，我一定革命到底！”

一群人强行把克非扯拽开，她的围巾散落在地上，露出的白晰的脸胀得通红。她奋力地扭过头，喊着：“爸爸，我还来看您，还来——”

张霖之咬紧牙沉默着，沉默得像一座活火山，在酝酿着喷发，酝酿着怒吼！这一天整整24小时，他粒米未沾，滴水未进。在敌意、冰冷的盯视下，在鬼蜮缠身般的痛苦中，他在写交代用的白纸前坐了5个多小时，最后端端正正地写道：“我再次申明，说我在党的会议上攻击毛主席的那些话，纯属造谣陷害。你们搞了我这么多天，费了这样大的功夫，给我扣上死党的帽子，可是没有任何事实，今后像这样的逼问，我一律拒绝回答。”

这就是张霖之在被批斗毒打52次，关押30多天后，第一次交出的“坦白”材料！

除了他的妻子儿女之外，这些天来，还有许许多多的善良的人在想方设法地营救张霖之。从高级干部到伙房大师傅，从左邻右舍到素不相识的煤矿工人。虽然一次次上告电话都被粗暴的回绝挂断，一封封呼救信被“中央文革”的信访组扣压，但是人们还在写、

在奔走……。只是，谁都没想到，对张霖之部长的迫害，远远超出了挂牌、游街、戴高帽、“喷气式”、辱骂、毒打、狂叫。当人们知道这一点时，已经太晚了。惨祸来得是那样快——

1967年1月21日晚6时。张霖之瘫倒在床上。这一天，北京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搞“庆祝夺权胜利”游行，他，作为俘虏和战利品，举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陪游陪斗6个小时。此时，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一点气力。忽然，外面一阵纷乱的脚步，看守推门侧倚，放进七八个人来。未等张霖之张口，已被拖到地上，接着又被按跪在一张长方条凳上，脖子上挂了一捆东西。张霖之头上的汗珠噼哩啪啦掉下来。原来，那是一个用褥子裹着的大铁炉。见他颤颤巍巍，暴徒一把抓住他的头发，大声吼道：“张霖之，你是不是彭真的死党？”

“是正常的工作关系，上下级关系。”

“你是不是常常深夜到彭真家开会？”

“很少。”

“干什么去了？”

“商量工作。”

“胡说……”

“啪！啪！”暴徒左右开弓，打得张霖之嘴里连血带沫子淌下来，舌头都嘛了，像棉花瓤子塞在口里。眼角挨了一拳，他一只眼睛被血糊住，另一只眼大睁着盯着凶手。“你还敢不老实——”不知谁，照准凳腿儿一脚踢去，凳倒人翻。张霖之的头被那个铁炉子坠着，重重磕在水泥地上。暴徒们又把他揪起来。

带着铁卡子的皮带和军用帆布腰带像雨点一样抽落下来，疼痛的抽搦散布在他脸上每一根筋络，冷汗直冒。但张霖之仍然水吭一声。血，迸溅着，溅到四壁。飞舞的皮带铁头打塌了他的左眉骨、打裂了后脑骨、打破了衬衣。他下意识地蜷缩着，终于两眼发黑，又扑倒在地上。

此刻，仿佛有一大团热雾流入张霖之的大脑，把眼前的一切全

都遮掩住了。唯有那只 200W 的电灯像一只吐着白焰的眼睛在逼视着他。眼前仿佛是一排排黑洞洞的东西。是枪口？不，不是。四四方方的，这不是重庆渣滓洞集中营牢房吗？1949 年底，当他率大军挺进大西南时，走到湖南常德，接中央军委十万火急电报“速达重庆，挽救山城”。原来，垂死的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开始烧城、炸厂、杀人了！解放军人不卸甲，马不卸鞍，七千里昼夜行军，每个人的心里都响着一个声音：快！快去营救难友，快去搭救山城的父老兄弟姐妹。当大军提前三个月赶到这座美丽的西南重镇重庆时，景象惨不忍睹：全市 13 条主要街道被烧成一片瓦砾，数九寒天打着赤脚的孤儿在废墟上爬滚，哭喊着父母。歌乐山下，渣滓洞铁门前，倒着一片片焦黑的尸体。那是越狱突围的难友们被美式火焰喷射器烧死的残骸。漫山遍野弥漫着难闻的气味，苍凉的山头有一只嗜血的秃鹫在盘旋……

多少个年头过去了，啊！那是河北巨鹿县城的城门，上面贴着“悬赏共匪红张人头 500 光洋”的告示。一群孙传芳的兵痞端着明晃晃的刺刀查问着行人。他，身着蓝布长衫，手提药箱悠然自若地向那里走去。忽然，他眼前出现了一片红云，一群群衣衫褴褛的乡民从红云里、从土屋、从草垛、从公路、从田地，涌向门前蹲着石狮子的县衙门。斧头、镰头、扁担、烧火棍，黑褐色的脊梁、胳膊……形成一股洪流。这不是他领导的盐民暴动吗？怎么，一瞬间粗黑的拳头变成了细嫩的白手，土布衣裤变成了洋布校服。怎么怎么，那些镰头变成了警棍大刀。呀！北洋军的马队冲过来了，周围响起了震天动地的吼声：“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打倒反动黑暗的军阀统治！”——这不是他参加领导的保定二师学潮吗？又变了，眼前的一切又变成了火流般的长江，万千风帆在曳光弹、信号弹、海岸炮弹的映照下，呈现出红、黄、白、灰色。红旗终于插上了天堑南岸。渡江战役的胜利真让人陶醉啊！突然，又是那一排，四四方方的黑洞，一只大手抓住竹签子在墙上刻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愿把这牢底坐穿！”……